

Postmoderne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谢建文 著

德语
后现代主义
文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07BWW019）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谢建文 著

德语
后现代主义
文学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谢建文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6

ISBN 978 - 7 - 5426 - 5185 - 3

I. ①德… II. ①谢… III. ①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IV. ①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0608 号

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著 者 / 谢建文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字 数 / 360 千字

印 张 / 25.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185 - 3/I · 1032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57123907



谢建文

1984年武汉大学文学学士，1996年武汉大学文学硕士，200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曾多次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等学习和研修。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语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完成所主持或独立承担的校级、省部级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子课题负责人）；出版学术专著1部、编著3部（副主编）和文学译著6部（含合译），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五十篇。曾获“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等。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引言 / 1

第一章 现代与后现代 / 4

第一节 概念意义 / 4

第二节 关系之辨 / 8

第二章 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 / 12

第一节 诗学讨论 / 12

第二节 历史脉络 / 32

第三章 言语游戏与语言真实:《骂观众》、《卡斯帕尔》和《剪贴》 / 47

第一节 戏剧模式与句法逻辑:汉德克的《骂观众》和《卡斯帕尔》 / 47

第二节 “词语文化泥潭”与图像突围:布林克曼的《剪贴》 / 61

第四章 主体消解与社会批判:《消除》、《米奈蒂》、《修正》、《短筒于长别》和《年轻人》 / 77

第一节 艺术家与对立的现实:伯恩哈德的《消除》、《米奈蒂》和《修正》 / 77

第二节 寻访与游戏:汉德克的《短筒于长别》 / 109

第三节 主体衰败:施特劳斯的《年轻人》/ 124

第五章 发现的幻象:《缓慢的发现》和《最后的世界》/ 139

第一节 慢的逻辑与陷阱:纳多尔尼的《缓慢的发现》/ 140

第二节 文本踪迹:兰斯迈尔的《最后的世界》/ 162

第六章 日常生活的平面叙事:《纤维之国》、《个人专辑》和《简单的故事》/ 177

第一节 边缘性耗费:克拉赫特的《纤维之国》/ 177

第二节 流行乐标记:施图克拉德-巴勒的《个人专辑》/ 196

第三节 乌托邦瞬时:舒尔策的《简单的故事》/ 210

第七章 革命与历史的寓意表达:《任务》/ 223

第八章 写作框架下的性别话语:《埃德蒙德:渴念的故事》和《雨的小说》/ 236

第一节 爱与写作:洛伊珀尔特的《埃德蒙德:渴念的故事》
/ 236

第二节 临水诱惑:杜维的《雨的小说》/ 247

第九章 身体性的后现代嬉戏:《香水》、《睡眠兄弟》、《蝙蝠》和《颅底课》/ 258

第一节 气味动力学:聚斯金德的《香水》/ 258

第二节 听能和乐音里的爱与死:施奈德的《睡眠兄弟》/ 268

第三节 历史沉默的回声:拜尔的《蝙蝠》/ 281

第四节 神经生理学隐喻:格林拜恩的《颅底课》/ 297

第十章 结论 / 310

附录 / 320

- 一 缩略语 / 320
- 二 研究所涉文本 / 322
- 三 作家作品与文集 / 324
- 四 作家研究中文小辑 / 362
- 五 参考文献 / 375

后记 / 399

引言

从今天的文学立场出发,我们对后现代在德语文学中的发展状况,已可做出清晰判断。后现代最初主要是在德国文学界内引起反响,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参与了讨论。之后,德国哲学界也对后现代做出反应,但时间上并非是一种跟进。实际上,是他们的认识,赋予了后现代在德国思想文化框架下的基本形态。

研究表明,最终被曲折接受和较普遍认可的后现代观念,主要体现为由德国哲学家沃·威尔什咀嚼过来的多元性。这一多元性对德语文学发展本身并不具有规定作用,但影响力明显。至少,它作为一种视角,影响了文学批评界对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察与思考。

在思想和诗学讨论之外,德语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借助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和作品确立起自身。这一派文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至九十年代中后期,成为当代德语文学重要的表现形态之一。

对于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国外学者或作家以论文、论文集、学位论文与专著等加以探讨,颇为深入。例如,作家罗尔夫·迪特尔·布林克曼对美国小说家兼文评家莱斯利·阿·费德勒的后现代主义早期版本,做出理论探讨和文学创作实践上的积极回应;学者兼作家汉斯-约瑟夫·奥尔特海尔较早关注后现代在德语文学中的发展,认为后现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巨大,促使德国文学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的日耳曼学研究者保罗·米夏埃尔·律策勒对德语文学中的后现代问题连续追踪,但不主张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德语文学以“一般性标签”加以归纳;托马斯·安茨教授则主要在与新主体性文学相区分的前提下

来描述后现代主义,并将其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姿态的文学现象,纳入文学史编年序列考察;而学者鲍姆伽尔特,则对德语后现代文学事实性的存在表示了强烈的怀疑。

除了对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所做的一般性分析外,部分个案研究也颇为细致。主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有相当数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将一批创作活跃、与后现代思想文化氛围至少形成了某种呼应的作家纳入了研究视野。探讨对象中包括托马斯·伯恩哈德、彼得·汉德克、博托·施特劳斯和海纳·米勒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作家。

然而,我们在肯定国外德语文学批评界在后现代文学研究问题上的基本贡献时,也不得不指出其研究的两点不足:1. 缺乏体系性理论梳理;2. 个案研究在考察对象上相对集中于彼得·汉德克等少数几个已有定评的后现代作家;而体裁选择上则以叙事文学为先,相对忽视戏剧与诗歌体裁的相关作品。

在国内德语文学研究界,当代学人对托马斯·伯恩哈德、彼得·汉德克、博托·施特劳斯和海纳·米勒等作家所做的研究,也颇具说服力。只是在对象选择上,这类探讨虽与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常规对象部分叠合,但着眼点一般不在后现代考察,因而主题相关性并不密切。

本论著在掌握国内外相关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前提下,基于国内外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已形成的研究成果,针对既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与断裂处,采用沃·威尔什等人的后现代观,结合德语文化语境要素,核心性地考察德语当代文学中后现代的发生、发展和构成,同时引入作家、作品坐标,经由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和断面探讨,以历时和共时的参证互见,在一系列关系考察中,厘定后现代框架下的重要作家与作品,剖析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肌理和细层,清理其与其他文学现象间的联系性,史论结合,以期准确把握和揭示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与美学特质。

研究所涉作家包括:托马斯·伯恩哈德、彼得·汉德克、博托·施特劳斯、罗尔夫·迪特尔·布林克曼、海纳·米勒、施特恩·纳多尔尼、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克里斯托夫·兰斯迈尔、罗伯特·施奈德、杜尔斯·格林拜恩、马塞尔·拜尔、英戈·舒尔策、达格玛·洛伊珀尔特、卡伦·杜维、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与本雅

明·冯·施图克拉德-巴勒。

论著主体内容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德语国家的发展史;德语后现代文学的一般特性和个性化特征;后现代主义在德语文学史上的位置与姿态;后现代主义与浪漫派和通俗文学间的联系;尤其是针对德语后现代作家群及其典型作品,以若干关系组来加以归类,并在充分考察相关作品的一般思想和艺术特征后,发掘其后现代特性,进而对比分析典型后现代作家价值取向与审美特质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第一章 现代与后现代

针对后现代问题,首先有必要在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后现代主义这两组概念间,简要进行梳理。

第一节 概念意义

现代是个时代概念,但又并非纯粹的时代概念,因为相对传统而言,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自称为现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历史上存在的不只是一种现代”^{〔1〕}。现代可以作为“基督教的世俗化”来理解,也可以是“新时代”,“一个只有新而不存在相同之物重复的时代”,还可从意识形态角度而不是从历史角度出发来指称“一种世界观的方案”——“现代性方案”^{〔2〕}。如果将现代理解为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分期的概念,则可以说,其标志便是“既是对理性的神化,也是对理性的绝望”^{〔3〕}。

现代性也是个矛盾概念。在启蒙和理性这样的关键词下,可以说,它“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而另一方面,又给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

〔1〕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结果》,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2〕Peter Koslowski: Vernunft und Geschichte: Die Modernität der Postmoderne. In: Joachim Pfeiffer: Das 20. Jahrhundert Konfigurationen der Gegenwart. Regensburg: Verlag Friedrich Pustet, 1998, S. 11, 14.

〔3〕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结果》,第30页。

剧变,并将“精神焦虑”植入其间,成为“‘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4〕。

托马斯·昂茨两分现代性,精辟地概括道:“‘现代性’一方面指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从精神史角度看,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传统密切相关。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就是新时期理性化、技术化、工业化和官僚机构化的过程,愈益复杂之社会系统整合的过程,对流传神话去魅的过程,批判性检视超验确定性的过程,出于进步信仰而扩展理性对外在自然支配力的过程,扩大理性在社会心理范畴对开化主体[……]自我克制之支配力的过程。另一种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与‘文明现代性’相区分,在文学、音乐、绘画或建筑内呈现出颇不相同的面貌和发展状况。在文学中,它与尼采、卡夫卡、乔伊斯、贝克特或保罗·策兰这样的名字紧密相联,与世纪转折期的文学、与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或超现实主义这类运动紧密相联,与以丑和不和谐为对象的反古典且经常属实验性的美学紧密相联,与那些因封闭性、因高度的自相关性和因接受保留着文化精英的超拔性而显得晦暗不明且须加以诠释的文学文本紧密相联。”〔5〕

而现代主义,实际上就是审美现代性,系指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与现象,有其深刻的哲学和美学渊源,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电影、建筑及宗教等领域〔6〕。其中,作为现代性文化规划主要形态的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具有如下重要思想与艺术特征:追求“中心”、“深度”、“本源”、“整体性”、“等级秩序”、“确定性”、“形而上学”与“超验性”等〔7〕。

〔4〕 赵一凡《现代性》,见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641页。

〔5〕 Thomas Anz: Moderne, Postmoderne? Botho Strauß' „Paare, Passanten“. S. 106 - 107. 此外,赵一凡将现代性三分为“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参见赵一凡《现代性》,第642—649页;尚可参见 Wolfgang Iser: Unsere postmoderne Modern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7, 5. Aufl., S. 46 - 52; 参见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132—134页;作者几乎是平行地引述了卡利奈斯库、鲍曼等人区分现代性的观点。他这样来转述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分析,“现代性在西方历史上体现为两种规划,一种伴随着启蒙运动一起成长的文化规划;另一种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一起发展的生活的社会形式”。这两种规划也可称作“文化的(或审美的)现代性”与“启蒙的现代性(或社会的现代化)”。关于文明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卡利奈斯库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和文化(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或者如鲍曼所述,“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6〕 姚乃强《现代主义》,见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51页。

〔7〕 伊·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盛宁译,见让-弗·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赵一凡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24—125页。

关于后现代,向来歧见纷繁。尤其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起源时间、涵盖面、概念意义和与现代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多有争论。

威尔什归纳了后现代概念成疑的四个要点。他认为,首先,后现代概念的“合法性”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相应的社会现象佐证这一术语,后现代只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还有人认为,即便存在“这类新现象”,但时代划分的任务也更多只是后几代人和未来之历史学家的事情^[8]。其次,后现代概念的“应用范围”也颇值得讨论。它在文艺学、建筑学、绘画、社会学和哲学等范畴均有较大发展^[9]。再次,这一概念的时间起点,也存在不同算法。于阿诺德·汤因比,后现代始于1875年;对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来说,与其后现代立场最为接近的,却是亚里士多德^[10]。意即后现代因子可远追古希腊时期;最后一点,后现代的涵盖也成为问题。意见对立而多样。后现代既可以是新技术时代,又可以是对技术统制的告别;既可以是分离社会的新整合,也可以是一个更加多元和片断化的时代^[11]。

不过,威尔什对后现代自有清晰的认识。他与利奥塔对知识转型后的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一脉相承,尽管其认识来源非止利奥塔一脉。

按照威尔什的理解,后现代主要具有如下五个特征:“一、‘后现代’是一个人们用以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其标志是机械论世界观已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二、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三、后现代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四、后现代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生活设计、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便是真理、正义、人性、理性也是多元的”;“五、这种多元性原则的直接结论是: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12]也就是说,后现代概念虽引起很多争论,却涵盖明晰。

[8] Vgl. Wolfgang Iser: Unsere postmoderne Moderne. S. 9.

[9] Ebd.

[10] Ebd. S. 10.

[11] Ebd.

[12] 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前言部分),章国锋译,见让-弗·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第46—48页。

后现代主义^[13],作为后现代的文化“方案”^[14],体现为当代西方一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一度风靡欧美,相关领域代表者众。一份并不全面的名单,也足以展现这一社会、文化思潮壮观的图景。

后现代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思想家与学者包括:“伽达默尔、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利奥塔德、弗·杰姆逊、雅克·拉康、德里达、福科、德勒兹、马尔库塞、斯潘诺斯、海登·怀特、库恩、费耶阿本德、查尔斯·纽曼、布朗等等。”^[15]当然,作为后现代思想先驱的尼采也不容忽视。1888年他便宣告了虚无主义的来临。后现代争论的最基本主题之一,就是“围绕现实性、或者现实性的缺失、或者多元现实性”展开的,而尼采式的虚无主义,正是“对这种流动无着的现实感的最直接反应”^[16]。尼采对后世主要后现代思想家例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和罗蒂等人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后现代性早期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也同样不可不提。这便是海德格尔^[17]。“海德格尔从前现代或反现代立场(‘存在’的立场)上所提出的对现代社会的有力批判,成为德里达、福柯和利奥塔这几位法国首屈一指的后现代主义者‘磨坊’[里]的‘谷物’。这是一个思想转换的独特故事,基本上说来,是一个方式转换的故事,本世纪20年代的德国右派所构想的现代性批判,成为法国和美国后现代左派的经典。”只是沃林也认为,“在一种令人惊异的歪曲中,海德格尔[才]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上的教父”^[18]。

文学理论与美学领域内的后现代理论家则涉及:“罗兰·巴尔特、伊哈布·哈桑、伊格尔顿、洛奇、洛德威、佛克马、克莉丝蒂娃、伊瑟尔、德·曼、米勒、布鲁姆、哈

[13] 其实,学界也常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相联系又相区分地使用后现代性这一概念。在大卫·莱昂看来,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后现代的文化方面,后现代性的侧重点则在其社会方面。而且,后现代性也是个具有多层涵义的概念,“属于社会思想范畴,因为它警示我们去注意20世纪末发生的一些重大社会和文化变迁。但卷入后现代性论争的大部分人更了解它的文化侧面,诸如艺术、建筑和电影”。同时,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想或者批判方式,已存在于知识分子头脑中,也存在于传媒之中。参见大卫·莱昂《后现代性》第二版,郭为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

[14] Vgl. Wolfgang Iser: a. a. O. S. 4.

[15]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见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362页。这份名单所提及的哲学家如哈贝马斯,是否系后现代哲学家,值得商榷;此处和后续名单中个别人名的翻译,与通行译法也有差异,而且存在不尽规范之处。

[16] 参见大卫·莱昂《后现代性》第二版,第15页。

[17] 同上,第17页。

[18]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与后现代”,周宪译,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53页。

特曼、G. 格拉夫、阿兰·威尔德、J. V. 哈拉里、霍尔·福斯特、林达·哈奇、诺米·谢奥、苏珊·桑塔格、莱斯利·费德勒、理查德·沃森等等。”^[19]

文学领域内著名的后现代作家包括：“约翰·巴思、W. 布洛格、T. 品钦、D. 巴特姆、W. 埃比希、J. 艾什伯里、大卫·安亭、S. 什帕特、R. 威尔森、K. 冯内库特、J. 霍克斯、尤奈斯库、J. 波格斯、M. 本森、塞缪尔·贝克特、欧也尼·奥尼斯科、乔杰·路易斯、鲍杰斯、F. 纳波科夫、哈罗特·品特、B. S. 约翰逊、雷纳·海彭斯托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罗伯-格里耶等等。”^[20]此外，在后现代文学旗帜下，尚可集合起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与伊塔洛·卡尔维诺等人^[21]。

在艺术领域内，则绕不开这样一些艺术家的名字：“约翰·凯奇、斯托克豪森、P. 布雷兹、劳申伯格、J. 丁格里、J. 布里斯、J. 施那伯、皮戎、L. 查尔兹、T. 布朗、M. 蒙科、R. 文途里、C. 詹克斯、B. 波林、C. 摩尔、M. 郭瑞夫斯、E. 波菲子、K. 杰可布什、A. 瓦里尔、A. 库克斯、D. 里昂、H. 卡拉汗、E. 温斯顿、J. 扎柯斯基等等。”^[22]

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包容广泛而庞杂。

第二节 关系之辨

从发展形态上看，后现代主义可细分为文学艺术、哲学和社会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等；从价值诉求上看，在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之外，也可清理出后现代主义的肯定性向度^[23]。

[19]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第362—363页。

[20] 同上，第363页。德语后现代作家，未能在这一名单中列示。

[21] 参见唐建清《国外后现代文学》第二章“后现代文本举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69—126页。

[22]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第363页。

[23]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代前言）》，见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9页。除了一般所理解的“摧毁、解构、否定”的“向度”，后现代主义还存在“积极的、建设性的内涵，亦即[……]建设性向度”。此向度体现于“倡导创造性”、“对多元的思维风格的鼓励”和“倡导对世界的关心爱护”。王治河《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代序）》，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另可参见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第21—26页。

如果要归纳后现代主义的一般思想特征,王治河的相关分析相对割切,虽然在前述后现代概念解释中已不难见其大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对现代主义一元论、绝对基础、唯一视角、纯粹理性、唯一正确的方法的否定,对现代个人主义、帝国主义、家长制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否定。”^[24]可以看出,这一界定的前提是与现代主义相区分,而且体现为否定。

但是,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其实是存在不同视角的。否定说只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下面的几种解释,有助于我们解决设定的关系认识问题。

卢克晒特尔总结既存的分析结论,归纳出“并置”、“极端化”和“内在性对立运动”这三种关系模式^[25]。在“并置”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共存,也可以是前者寓于后者,或在后现代主义中见出审美现代派的部分方案;而“极端化”,系指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极端形式,是完全承认异质和多样性并使之获得了彻底平等权力的现代主义;“内在性对立运动”,是将现代主义区分为文明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后,确认后现代主义是对文明现代性的反拨。

上述三种模式中,并置关系体现了以区分为特征的连续性。它成为我们讨论的出发点。

哈桑洋洋大观地列举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间诸多的差异^[26],并归纳了文学

[24]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代前言)》,第10页。

[25] Roman Lukschetter: Der postmoderne Impuls: Die Krise der Literatur um 1968 und ihre Überwindun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GmbH, 2001, S. 71-73.

[26] 与现代主义——对置的特征多达30余项,此处只选择性地列举若干后现代主义特征:例如,“偶然性”、“无序”、“缺失”、“扩散的”、“反讽”、“不确定性”、“内在性”等(伊·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第123—125页)。其中,“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又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不确定性”系参照现代主义的“确定性”而言,“主要代表了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之结果”(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王宁译,见弗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5页),具有“多重衍生性含义”,包括“含混、间隙性、异端邪说、多元论、随意性、反叛性、反常变态,以及畸形变形”。而仅最后一项又包容了“十多个目前常见的关于废弃一切术语:[……]分裂、解构、中心消失、[……]反界说、[……]反总体化[……]”等等(伊·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第125—126页)。“内在性”系与现代主义的“超越性”相对而言,“意味着后现代主义不再具有超越性,它不再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相反,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对现实、对创造的内在适应”(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或者说:“内在性则代表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第35页)上述后现代主义特征大部分与“分解主义的无中心世界概念”相关(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第34页)。

和艺术上之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与重构间的十一项特征^[27],明显将后现代主义置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或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隔开;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一个‘时期’通常就根本不是一个时期;而是一种历时兼共时的建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一样,也毫不例外”^[28]。这里指出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既相区分又有联系,而且可以共处于一个时期。

威尔什在关系问题上也认可连续而不是断裂。他先肯定了“后现代”的现实性,指出:“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并非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臆造,相反,[……]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现实”^[29],然后便强调:“后现代决不是”“一种超现代和反现代”,因为“其基本内容——多元性——即已为二十世纪的现代所鼓吹”,而“现代所迫切需要的这个东西[多元性],在后现代之中,得以在现实广泛的范围内实现”。因此,“后现代在内容上决不是反现代的,在形式上也不是简单地超现代的,而应被理解为二十世纪曾处奥秘状态的现代的大众化实现形式”^[30]。毫无疑问,威尔什在“多元性”上看出了后现代与二十世纪之现代之间具有“特别的亲合性”^[31],虽然按照他的解释,前者颇似后者的一种变异形式。

汉斯·伯顿斯通过考察一系列“后现代认识观念”,在其“尝试性的结论”里也曾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别”^[32]，“大多数批评家照样一致认为(尤其在文学技巧方面),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仍然存在着重

[27] 也就是“不确定性,片段性,经典的解体,‘自我’和‘深度’的失落,不可表现性、不可描述性,讽刺,种类混杂或种类变化的可复制性,狂欢性,行动、参与,构成主义性质,内在性”。Ihab Hassan: Postmoderne heute. In: Wolfgang Iser (Hg.): Wege aus der Moderne. Schlüsseltexte der Postmoderne-Diskussion.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4, S. 48 – 58.

[28] 伊·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第118—119页。

[29] 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前言部分),第45页。

[30] Wolfgang Iser: Unsere postmoderne Moderne. S. 6.

[31] Ebd., S. 83. 此外,威尔什认为,后现代与现代相对立,也只是与另一种现代,即与“新时期[笛卡尔以来的时代]含义上的现代”相对立。后现代告别了这一现代的“基本迷恋:自普遍性知识的规划、经世界史哲学的种种方案而至社会乌托邦的各类整体化方案一直延续着的一体性梦想”。Wolfgang Iser: Unsere postmoderne Moderne. S. 6.

[32] “[……]在最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几乎所有概念中,本体论的不稳定性问题是绝对的核心,正是意识到了中心的缺少、特权语言 and 高级语言的缺少被视为同现代主义的最显著的区别,而现代主义在几乎所有的批评家看来,则仍然不放弃某些中心,并且力图回避为后现代主义所接受的剧烈的不确定性之影响。”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第56页。